

王鹏廷 著

建安七子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建安七子研究

王鹏廷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安七子研究/王鹏廷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0
ISBN 7-301-07450-6

I. 建… II. 王… III. 建安七子-文学研究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4286 号

书 名: 建安七子研究

著作责任者: 王鹏廷 著

责任编辑: 马辛民

标准书号: ISBN 7-301-07450-6/I·067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mm × 1240mm A5 11.625 印张 338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序

鹏廷的论文即将出版,作为他的博士生导师,我自然感到十分欣慰。这不仅是他多年苦读精思的成果,也是他走上中国古典文学专业之途迄今学力取得稳步成长的证明。

鹏廷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实属不易。他出身农村贫寒家庭,经济基础对于任何一个有志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他恰恰在这一点上深陷困境。他读研究生前的学业是靠边工作边学习完成的,三年硕士生涯是靠亲友周济度过的。硕士毕业后他本可取得一份不错的工作,以纾解家庭长期的经济窘况。但他却立志学业深造,自河南负笈来京,虽用给恤乏,而攻读不倦。鹏廷在学期间的表现,当时就令我想起颜回的风范:“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而他也正是在不断克服困难过程中,练就了排除各种外部干扰专心学业的本领,同时又保持着待人接物方面的真诚谦虚品格,在同学中赢得尊敬。我不想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等等的老话,我想说的是,青年时期艰难困苦的考验,对于鹏廷而言,无疑是一笔终身的财富,它终将“玉汝于成”。

这部论文,是关于建安文学的。应当说,论题很普通,并无新鲜奇异之处。当初酝酿论题之际,我也曾经考虑过: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领域,建安文学历来是重点,也可以说是热点之一。既有的研究论著相对较多,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也较深入,而本时期的重要作家如“三曹”、“七子”、蔡琰等,一些研究者都对他们作过细致的清理和爬梳,似乎不存在多少有待开拓的余地,所以我一开始怀疑他能否做好这个题目。我觉得,对于一名青年学子而言,这题目的难度太大,与其在研究热点中重复他人的已有结论,不如找一块“生荒地”垦殖一番效果比较明显。于是我与他作了具体交流讨论。他怀着强有力的进取精神,详细陈说自己选题的想法和构思,我则利用自己的经

验向他发难,挑剔他的欠缺和漏洞。经过这样的切磋琢磨,修葺补正,他的想法渐趋于成熟,而我的怀疑态度也有所改变。尽管他的一些观点并未完全跳出前贤的藩篱,但我分明看出了在某些问题上鹏廷确有属于自己的想法,无论是对“三曹”或“七子”,对思想倾向或写作特色,对作家个体特征或时代的群体的风格。至于他肯定和吸收前贤的合理论点,符合学术进步的内在逻辑,本无可非议。要之鹏廷的这部论文,是在大量阅读作品原著,掌握前贤研究状况,又经过深入思考反复斟酌基础上产生的。它总体上平稳求实,但不乏自己的“突破点”,这些点有的属于“细化”,有的属于“深化”,有的属于“系统化”,更有一些经过周详论证的独到见解。这些突破点的确立,实属难能可贵。他要在研究热点领域营造起自己的阵地,提出一家之言,表现自己的个性,这比起“开拓生荒地”来更富于挑战性,具有独特的贡献和意义。相信学界同行,会对他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关注,并给予相当的评价。

鹏廷这本著作,是他攀登学术之巅的第一个台阶。凭着他良好的理解力和不懈精神,相信会在教书育人的同时,创造出更多学术精品,不断证明自我,嘉惠学林。是为序。

徐公持写于正月末,岁在甲申

导 言

“七子”之称，始于曹丕。他在著名文论文章《典论·论文》（载《文选》卷五十二）中将“七子”作为当时文人的代表提出：“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璉，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①，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馵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后世遂有“建安七子”之称。

“建安七子”在建安文学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对他们的研究从他们的当代就已经开始了。曹丕是建安七子研究的开山祖师。此后一千七百多年来，人们对建安七子的研究可谓不绝如缕。魏晋南北朝到唐代，七子文集尚存，论者能从整体上把握七子的创作成就和个性；他们的评价成为后世了解、把握七子创作成就的重要依据。宋元明清时期，七子的文集散佚，后又得到收集整理，对七子作品的分析评价主要出现在诗话论著和古诗评选本中；重在分析具体诗作的内容和艺术手法，评价研究向纵深发展，但对七子其他文体关注不够。这些研究或是对作家进行感悟式的评价，或是对作品进行点拨式的分析，虽涉及到作家作品的方方面面，但总的看来缺乏系统性，其深度和广度都有不足。

近现代以来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对七子的研究总的看来仍未全面展开，但像刘师培、鲁迅等人对七子作品风格特点的评述等都对七子研究有重要意义并影响深远，可说是使这一专题研究走向新时期的准备和奠基。他们的论列至今仍然是该专题研究的重要参考。

20世纪最后20年里，随着学术事业的开展，对七子的研究有了显著的进展。该专题研究一般作为建安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处

^① “七子”二字《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作“七人”

理(如各家文学史和有关建安文学研究的专著中大都可见到有关七子的论述),此间七子的诗赋尤为论者所关注;更重要的是,有关建安文学及三曹七子的研究资料得到系统的整理汇编,七子的文集也得到重新整理和评注(参见本论文附主要参考书目)。报刊中也陆续出现一些关于七子研究的专题论文。据我粗略统计,这20年里公开发表的研究建安七子的单篇文章,有关王粲的最多,有80多篇(另在1980年以前已出现10来篇关于王粲的研究论文);其次是孔融,有20多篇(另在“文革”期间,各地报刊出现一些讨论“孔融让梨”及其被杀的文章,乃图解“儒法斗争”之什,无学术价值,兹不计);有关徐幹、陈琳、刘桢的各有10多篇;有关阮瑀、应瑒者均不足10篇。可见关于建安七子的研究,单从分量上看,是很不均衡的(这固然是受诸人创作成就的高低和今存作品的多少限制)。此外,将建安七子作为整体研究的文章约有20篇,而真正对七子创作成就作深入开掘者并不多见。至于针对建安七子的研究专著,也出现一两种,在对七子资料整理和文风论列上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也都不无缺憾之处^①。

^① 将建安七子作为专题进行研究的专著据我所见有两种:一种是台湾学者江建俊所著《建安七子学述》,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2年2月出版(“文史哲学集成”丛书之一)。其书重在于“述”,绪论之外,七子各为一章,再分节分别论列诸人的生平事略、才情性格、政治立场、思想见解及诗文风格等。每章除了在“生平考略”一节列举材料较为详尽外,其他诸项均较为简单,且以整理转述前人论说为主。即以诗文风格特色一项为例,往往先就前人论说点明各人诗文风格特点,再列举若干代表作品稍作分析;其他各项也主要罗列前人的论述言论。其书罗列材料较为详实,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个人创见似不多,且对七子诗文风格分析不够深入周到。另一种是韩格平的《建安七子综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其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概论”,又分“时代氛围”、“作品主调”、“文学成就”三章。下编“分论”,七子各为一章(每章中各有“个人经历”和“文学特色”两项,惟“徐幹研究”一章多出“《中论》简述”一项)。是书重在于“论”,试图“从宏观上对七子文学创作的共性与个性进行一番整理和归纳”(其书《后记》),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似乎在两个方面不够理想:一是还没有真正把七子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这不利于揭示他们在建安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整体成就,不利于显示他们的文学史地位,也不利于通过对比显示他们个人创作的风格特色。二是书中对七子“文学特色”的某些提法有欠妥当之处,论述中也有欠圆满之处。如论述孔融的“文学特色”时,列出“理正气壮”一条,并认为“理正才能气壮”,二者有内在联系。其实这不一定符合孔融的创作实际。孔融确有一些文章义理清正(如他上给献帝的议对书疏),但都是在“心平气和”、理性为主的情况下作的,而他那些“气壮”的文章(如两篇“发辞偏宕”的难禁酒书)往往作于“气胜于理”的情况下,故多表现出“不能持论,理不胜辞”(曹丕《转下页》)

总之,从对建安七子的研究状况看,似乎存在着研究成果与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相称的矛盾。我们知道,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上承两汉,下开六朝,正处于中国文学史上质文代变的中间环节。文学史的自然流程和建安时代的社会风貌共同造就了这段文学。“建安七子”在建安文学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生活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有大致相同的出身经历,孔融之外的六子又有过相同的生活环境和创作环境,其文风有许多共同之处;另一方面,七子的生活、经历、思想、个性、政治态度以及创作又各有千秋,其文“各自成家”(沈德潜《古诗源·例言》)。这样,就有必要对建安七子的创作成就和文风异同加以详细研究。通过对“建安七子”的个案研究,可以更清楚地揭示文学史上为人称扬的建安文学的历史风貌及其成因,进而更清楚地认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脉络。

本书旨在通过对建安七子创作成就和文学风格的论述,显示他们对建安文学的贡献,并揭示他们在汉魏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故而本书始终以文学创作为中心,又不株守一隅、见树不见林;既力求将作家放在历史发展背景和具体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进行切实的考察,又顾及作家的全人和全部作品(当然以目前能见到者为限)。在作家论上,力求遵循“知人论世”的科学方法,结合作家生平勾画其生活的社会背景,从而揭示他们取得文学成就的动因;在作品论上,力求从作家的全部作品出发,考察具体作品创作的具体环境,高度重视前人时贤的有关论述,比照考订,参同比异,并合理采用“以意逆志”的思想方法认真体悟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动

(接上页)《典论·论文》)的特点(“气”基本属于感性,“理”乃属于理性,二者在根本上是一对矛盾。一般说来,论说文以理性为主,当“理正”时就往往难以“气壮”;而文学性的作品又以“气壮”为优,故孔融“气壮”之文颇有文学性而往往失之“理正”,即所谓“理不胜辞”)。在论述“理正才能气壮”这点时,作者没有举出孔融的一篇文章为证,仅列举了他的一些生活逸事,这又难说是“文学特色”了。再如,在论述陈琳的“文学特色”时,提出“鸿篇功力”一点,论述中先讲了撰写长篇的三个条件,而后分析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一文;可是所讲的三个条件与陈琳若即若离,分析《为袁绍檄豫州》的两个特点时又离开了“鸿篇功力”。又如,将“应机捷丽”作为阮瑀的一个“文学特色”,将“辩捷而深沉”作为刘楨的一个“文学特色”,都似有不妥之处。另外,该书在对某些史料和作品的处理上也有不甚谨慎的地方。

机,以期能对他们的作品有深入独到的领悟。

具体而言,本书拟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些尝试,以期推进“建安七子”这一专题的研究:

1) 切实考察建安七子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成长过程以及他们的政治态度、思想观念等,以揭示他们诗文创作的社会、文化、思想背景及其风格成因;

2) 就现有资料考察七子诗、赋、文各文体创作在题材内容上的特点、文体发展上的成就和艺术技巧上所达到的水平,结合汉魏乃至整个中国诗史、赋史、文史的发展状况,显示他们的创作实绩;

3) 紧密结合七子其人其文,系统探讨他们文学创作的共同风格和个人风格,并据以确立他们的文学史地位。

为此,本书基本上把建安七子作为一个整体(群体)对待,又不忽视各人的独立性,论述中以“合”为主,“合”中有“分”。如对于七人的生平事迹,他们在归曹之前各奔东西,甚少关联,文中采取分论;归曹之后,孔融之外的六人在曹营共事,联系密切,文中即用合论;而孔融入许后始终在汉朝廷供职,与他六人无甚往来,又区以别论。再如七子的文风,既有相同的一面(共同风格),又有不同的一面(个人风格);在相同一面中,既有属于一个时代的共同风格(时代风格),又有仅属于该群体的共同风格(群体风格)。文中即合论他们的共同风格(时代风格和群体风格),分论他们的个人风格。而在论述共同风格时,将七子的创作与三曹的创作进行了比较;在论述个人风格时在七子之间进行了比较。本文采用的这些基本论述方法是受了曹丕《典论·论文》的启发。曹氏将七子作为“今之文人”的代表一并论述,并主要在此基础上提出他对文学的看法(如“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而且“七子”名目一经提出,即为后世广泛认可,应该说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这个合理性和必然性主要就是七子创作有其时代和群体的共性。然而曹丕在论述中又明确区分了七人的创作个性和他们在不同文体创作上的成就(如“王粲长于辞赋”一段);他们创作中的这些区别是客观存在的。曹丕是七子研究的开山祖师,他的论述和处理方法应是最有权威的。论者借鉴于此,是期望对七子的研究能够尽量切合实际。

本书主干分上下两编。上编四章,“七子生活时代的社会政治特

点与思想文化特点”和“七子的家世与社会经历”两章围绕七子的生活和经历描述其时代和活动的氛围,旨在通过描述他们成长的环境揭示他们著述和创作的客观成因;“七子的社会政治观、人生观及其与汉魏思想文化发展的关系”一章旨在揭示七子的思想认识及其时代性特征,这也是他们文学创作形成各自文风的重要的思想基础(内在原因之一);“七子作品考辨”一章就他们一些在历代著录中有争议的作品或内容上有问题的作品进行力所能及的考证、辨析,这当然是作品论的基础。下编四章,“七子诗文创作实绩略述”一章综述七子诗、赋、文各文体创作在题材、文体和写作技巧上所达到的水平,结合文学史的发展状况揭示七子创作在文体上的发展和题材上的开拓成就,以显示他们的创作实绩;以下两章集中讨论七子文学创作的共同风格和个人风格;最后一章“结语”主要就七子的创作实绩和文风揭示他们在汉魏时期文学发展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本书力求以事实说话,将“述”与“论”结合起来,“述”以证“论”、“论”以引“述”,以求切合实际、言之成理。

目 录

序..... 徐公持(1)

导 言..... (1)

上 编

第一章 七子生活时代的社会政治特点与思想文化特点 (3)

第一节 社会政治特点..... (3)

第二节 思想文化特点 (16)

第二章 七子的家世与社会经历 (26)

第一节 七子的家世与青少年时代 (26)

第二节 七子的社会经历与创作活动 (37)

第三章 七子的社会政治观、人生观及其与汉魏思想

文化发展的关联..... (69)

第一节 七子的社会政治理想 (69)

第二节 徐幹等对汉末社会现实的分析批判 (84)

第三节 徐幹等的人生修养论 (91)

第四节 阮瑀、应场的文质论 (101)

第五节 七子言行与汉魏思想文化发展的关联..... (103)

第四章 七子作品考辨..... (118)

下 编

第五章 七子创作实绩略述..... (141)

第一节 七子的诗创作..... (143)

第二节 七子的赋创作..... (155)

第三节 七子的文创作..... (166)

| | |
|--|-------|
| 第六章 七子文学风格论析(上):共同风格 | |
| ——兼与三曹文风比较 | (190) |
| 第一节 七子文学创作的精神内容特色 | (190) |
| 第二节 七子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特色 | (209) |
| 第七章 七子文学风格论析(下):个人风格及其比较 | (236) |
| 第一节 孔融:“气扬采飞” | (236) |
| 第二节 “公幹气胜,仲宣情胜” | (243) |
| 第三节 陈琳与应玚 | (260) |
| 第四节 阮瑀与徐幹 | (273) |
| 结 语 从“汉音”到“魏响”:建安七子的文学史地位 | (285) |
| 【附】 建安七子研究史略述 | (304) |
| 第一节 开创期:魏晋 | (304) |
| 第二节 总结期:南北朝及唐宋 | (311) |
| 第三节 深化期:元明清 | (330) |
| 第四节 转型期和全面展开期:近现代以来 | (342) |
| 主要参考书目 | (351) |

上 编



第一章 七子生活时代的社会政治特点与思想文化特点

建安七子中,年龄最长的孔融出生于汉桓帝永兴元年(153),而最后去世的徐幹病逝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218),前后跨时66年。这几十年正是汉魏之际社会最黑暗、时事最纷乱、政治局势和思想意识领域变化最剧烈的年代。而七子的言行举动又无疑与这个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可以说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是形成他们人生观念、政治态度乃至处世方式、言辞特色的重要基础。因此,考察一下七子生活的时代特点对于了解他们的生活、作风、人品、思想及其创作都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社会政治特点

汉末社会,乱自上作。朝廷的黑暗腐朽使广大士人奋起抗争,结果士族受到沉重打击,士风遂由“婞直”走向“浮华”。而随着各地军阀纷纷崛起,重建社会秩序有了可能,士风也逐步转向“通悦”与昂扬。这样的社会政治特点与当时文人的创作有着深刻的联系。

一、乱而将治的政治背景

东汉的开业皇帝光武帝刘秀登基之后,汲取外戚王莽篡权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加强皇帝专权的措施,刘秀与其后的明、章二帝做到了政由己出。可是,接下来从和帝起,便开始了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权的政治局面。大致说来,和、殇、安、顺、冲、质时代,外戚势力最盛,

到冲、质、桓帝时的梁冀，外戚擅权达到顶峰，但宦官的势力也在逐渐发展；延熹二年(159)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五人共谋剪除外戚梁冀后直到灵帝末年，宦官势力达到鼎盛。灵帝中平六年(189)外戚何进与宦官张让等同归于尽、董卓率军入洛之后，东汉皇权又完全陷于军阀控制之中；而从献帝建安元年(196)曹操迎帝都许起，国鼎实际上已移于曹家了。可见，建安七子生活在汉末宦官弄权、社会大乱、刘汉政权逐步衰落、曹魏势力渐趋崛起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点，借刘勰的话说，就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到“区宇方辑”(《文心雕龙·时序》)，亦即由衰乱到将治。

汉末的宦官集团是皇权身上的毒瘤，它既由皇权生发出来，又反过来吞噬着皇权，更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后汉书·宦者列传》描写汉末宦官集团的丑恶行径曰：

……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若夫高冠长剑，纁朱怀金者，布满宫闱；莠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縠之积，盈仞珍贓；嬖媵、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缃绣。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所以海内噬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因复大考钩党，转相诬染。凡称善士，莫不高被灾毒。

这个集团固为士人君子所不齿，因此正直的官僚如李膺之属便起而反对之，这一行动又得到京师太学生的舆论支持。而宦官群对待这股反对势力自然极度仇视，便借助皇权予以残酷镇压。桓帝延熹九年(166)和灵帝建宁二年(169)两度兴起的“党锢之祸”就是宦官势力对正直士人势力的疯狂扫荡。第一次延续到次年，牵连二百余人；第二次延续十多年(直到黄巾军起)，牵连数千人。

然而,宦官势力之所以能够如此猖獗,主要是得力于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纵容和支持。其实桓、灵二帝肆意搜刮、卖官鬻爵、奢淫无度、无恶不作,其丑恶行径又较宦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多数士人在反对宦官势力的同时,极度厌恶当时的腐朽统治,看到汉室已无可救药,对汉政权也彻底失望了。比如曹操,本有匡复之志,为议郎时,曾多次上书切谏,陈对是非,终因看到“政教日乱,豪猾益炽,多所摧毁”,“知不可匡正,遂不复献言”(《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走向拥兵自强之路。再如郭太曾私自悲恸曰:“《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但未知‘瞻乌爰止,于谁之屋’耳!”(《资治通鉴》卷五十六)又如皇甫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故信都令汉阳阎忠即劝说他“顺时以动”、“因畿以发”,代汉自立;其理由是:“且今竖宦群居,同恶如市,上命不行,权归近习,昏主之下,难以久居,不赏之功,谗人侧目,如不早图,后悔无及。”(《后汉书·皇甫嵩传》)又,许邵(子将)不仕,尝对人曰:“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后汉书·许邵传》)徐稚(孺子)亦避仕,称说时局:“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后汉书·徐稚传》)总之,当时士人对待汉室的态度,就如司马光于《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所说:

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淆,是非颠倒,可谓乱矣。……不幸承陵夷颓敝之余,重以桓灵之昏虐,保养奸回,过于骨肉;殄灭忠良,甚于寇讎。积多士之愤,蓄四海之怒。

可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汉末王纲解纽,人心大乱,各行其是,其来久矣。王船山《读通鉴论》也说:“祸始于桓、灵,毒溃于献帝,日甚月滋,求如先汉之末王莽篡而人心思汉,不可复得矣。”因而,当时的士人,或如《后汉书·党锢列传》所谓:

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